



(法) 史式微著

江南传教史

第二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B979

DHB/2
江南传教史

第二卷

〔法〕史式微 著

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 de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Changhai, Chine, 1914.
根据上海土山湾孤儿院印书馆 1914 年版本译出

江南传教史
第二卷
〔法〕史式徽 著
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 字数 249,000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3188·47 定价(七): 1.20 元
印数: 0,001—5,300 册
内部发行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年文思主教时期(1856年至1862年)

第一章 教区概况.....	3
一、1860年英法联军之战	3
教区的新编制 中国同英法断交 葛罗男爵来上海; 向神父们提出的建议 1858年的条约; 伏击大沽口 梅德尔会长神父任江南中国官员与法国当局间的调解人 年文思主教的祝圣 北京朝廷拒绝赔偿大沽事件的损失; 英法对中国宣战 谈判时期的上海	
二、1860年联军战争时期的教区	14
孟斗班将军到上海 太平军进攻上海 欧洲人决计保卫上海 1860年战争时期的上海 蔡家湾的凶杀事件 太平军占领徐家汇 太平军被逐出上海 英法联军的战果; 1860年的条约 法国军队来上海 归还老天主堂 耶稣会计划在北京设立科学机构	

三、从1860年英法联军到太平战争结束（1861年至1864年）.....43

叛乱者远离上海 卜罗德海军上将和教区 浙江长毛入侵浦南和浦东 郊区的战役 费都尔神父和卜罗德将军之死 英军撤退 “常胜军”与戈登 江苏的绥靖 年文思主教和梅德尔会长之死 郎怀仁被任命为主教

第二章 教务细节.....71

一、上海.....71

难民来上海；援助教友；向教外人传教 徐类思主教视察教务 董家渡；教友突增；节日礼仪；潘奥定修士的施诊所；徐家汇孤儿到上海避难；修道院 洋泾浜堂口的发展；杜若兰神父的传教；创办公济医院；规划女青年教育事业

二、徐家汇.....94

建筑与变迁 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徐汇公学的进展 本期的亡者

三、松江..... 103

马义谷神父与太平军 诸巷会教友 余山

四、浦东..... 109

五、教区西部..... 112

葛必达和桑理爵神父在太平军占领区

六、崇明与海门..... 119

一起反年文思主教的骚扰事件 传教事业

七、小结 太平军之战后期的江南教区..... 123

第二部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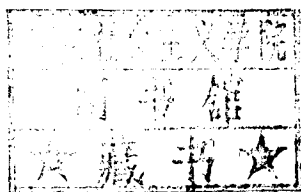
郎怀仁主教时期(1864年至1878年)

第一章 教区概况.....	131
一、1869年的教难	131
郎主教到上海 戴元英监会铎的巡阅 柏尔德密协 定和无形取消的秘密文件 南京、安庆创建住院 金式玉神父西区探险 镇江、扬州、苏州教会的建 立 郎主教欧洲之行 召请圣衣院与拯亡会修女来 华 郎主教与江苏官员	
二、从1869年至1875年的教难.....	174
部署安庆 宁国府教友会口的创建 1869年安庆和 建德的暴动 罗淑亚先生长江之行 得到的赔偿 马新貽阻止南京暴动 天津屠杀后的恐怖 谷振声 神父余山许愿 建造圣母进教之佑大堂 马新貽被 刺 郎主教参加梵蒂冈公会议 1871年的咨议会 天津屠杀的赔偿 若干洋人反对天主教 中国方面 的记录 创立徐家汇天文台与博物院 创立若瑟学 校 创立上智母院 创立圣方济学校 创立虹口圣 心堂 部署苏州堂口 余山开堂 宁国府开教初期 的辉煌成就	
三、从1875年的教难到郎主教逝世	221
长江下游地区对育婴事业的诬蔑 南京的危险 宁 国府教难 黄神父被害 白来尼先生到南京 长江 下游与沿运河一带的教难 南京的诉讼 恢复宁国	

府的事业 水东的朝圣 郎主教病危期间 郎主教 的逝世与哀荣	
第二章 教务细节	273
一、上海	273
上海的变化 董家渡修道院 名人来访 教友善会 洋泾浜 本堂生活 耶稣教教徒的攻击 老天主 堂周围的事业	
二、徐家汇	285
神父住院 神学院与徐汇公学 学习计划 翻译学 校的计划 土山湾 工场间 印刷所 主要印刷品	
三、女修会	300
圣衣会女修院的开创 迁到土山湾 拯亡会 圣母 院 圣若瑟院 上智小学 仁爱会修女 公济医院	
四、教区东部	317
浦东 浦西 苏州 常州 崇明 海门	
五、教区西部	330
镇江 南京 安庆 宁国府	
六、总结	345
附录一 1840年至1878年的南京署理主教与宗座代牧 主教	349
附录二 1840年至1878年的教务巡回使与教区会长	351
附录三 1848年至1878年的法驻沪领事	352
附录四 教区的进展(1878年至1923年)	354
主要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358

第一 部 分

年 文 思 主 教 时 期
(1856 年 至 1862 年)



第一章

教区概况

一、1860年英法联军之战

教区的新编制 中国同英法断交 葛罗男爵来上海；向神父们提出的建议 1858年的条约；伏击大沽口 梅德尔会长神父任江南中国官员与法国当局间的调解人 年文思主教的祝圣 北京朝廷拒绝赔偿大沽事件的损失；英法对中国宣战 谈判时期的上海

耶稣会总会长神父贝克斯向年文思会长转达被任命为江南署理代牧的指令时，同时指示他必须接受任命。并告知，神父在一次召见他时，曾口头颁示，在中国的两个耶稣会传教区的会士的修会生活，仍由一位会长管理。会长的任命和撤换，按照耶稣会会典办理，并享有前任会长所有的一切职权。^①

南格禄神父曾被选中担任这个棘手的职务；可是，任命到达中国时，他已不在人世了。梅德尔神父乃仍保持伏伯禄监会铎在临终前授给他的会长职权，之后又得到了总会长的追认。^②

但根据罗马传信部1851年8月12日关于耶稣会代牧主教部的令规定：教区的代牧主教即是教区内耶稣会的会长，负

有领导管理之权。有关修会纪律事项，应遵照该会会典办理。这部令一直执行到1880年4月4日，即总会长贝克斯得到圣部修改部令的指示时止。我们将在后面谈及此事。

为了尊重徐类思主教，年文思在开头数月，只顶衔宗座署理代牧；^③ 郎怀仁就不同，诏命到后，他即请人祝圣，任直隶南区宗座代牧，并开始治理该教区。^④

1856年11月25日，两位当选者对有关主教和会长之间在实践上的职权范围进行了商讨，“会长对会士们的管理权既要完整独立，又要不妨碍代牧的行动”^⑤。耶稣会法国省参赞吕比荣神父于1857年1月28日，对这个问题又寄来了一份意见书。^⑥

年文思在管理教区的最初几年本想兼任会长，直接指挥会士。之后，经过认真考虑，完全听从了总会长神父的不同意见的劝告。总会长认为代牧主教教务繁重，不可能再有余暇去关心传教士的神修生活以及是否遵守会规等琐事。^⑦

于是，梅德尔神父仍担任会长兼主教的大代权（副主教）之职。

① 总会长贝克斯1856年5月7日致年文思会长信，见《徐档》，卷宗B5；贝克斯1856年5月6日致梅德尔会长信，见《徐档》，卷宗F12。

② 1856年12月3日。见《中总》，第3卷第331页。

③ 总会长1856年5月6日、7日信；总会长1856年2月20日致梅德尔会长信，见《徐档》，卷宗F12。

④ 见本书，第1卷第339页。

⑤ 见《中总》，第3卷第3章第21页上年文思1855年12月4日信，又《中总》，第3章第22页。

⑥ 见《徐档》，卷宗F13。

⑦ 1856年和1857年的几封信，见《中总》，第3卷第3章第27—29页；见薛孔昭：《梅德尔神父传》，第103页起。

这位新宗座署理是在最艰巨的情况下上任的。中国政府既无力遏止给它造成种种困难的太平军暴乱，而又在两件严重的事情上得罪了英国和法国。1856年10月，广东巡抚手下的官员，没收挂有英国旗的划艇“亚罗”号，并拒绝赔偿，英国人就炮轰了广州的炮台及城市。1856年12月14日，中国人进行还击，烧毁了一切洋行和洋商机构。当时，法国尽管在广州也有侨民及其保护者受到损害，但仍保持着中立。1856年2月29日，外方传教会传教士马赖神父在广西西林县被杀，中国政府又拒绝赔偿损失，直到此时，法国才下了最后的决定。1857年初，英法两国决定以武力迫使中国作出必要的让步。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勋爵和法国全权大臣葛罗男爵，由一支远征军的舰队护送，启程来到中国。^①

事情发生在1857年至1860年，在这里，我只叙述对江南教区有关的一些情节。广州被攻占后（1857年12月19日），法、英、美、俄四国向北京朝廷分别发出照会，阐明基督教列强的要求——1858年2月26日，由龚大德和俄理范两位秘书去苏州，把照会交给江苏巡抚。当时敏体尼先生已回上海领事馆，是他安排人员伴同他俩去苏州的。江苏巡抚热情地接待了使团的秘书，并负责把照会转呈满清朝廷；^② 1858年3月21日，两江总督转来了朝廷的答复，仍然拒绝一切赔偿。

于是公使们决定北上，舰艇直行至白河口。1858年4月初他们在上海时，葛罗男爵对教区事务非常热情，利用他在上海逗留时期，同神父们进行了重要会谈。当时会长年文思神

^① 见高田：《征华史（1857—1858年）》及《征华史（1860年）》；又《远东》，见《通史》，第2卷第725页。

^② 见高田：《征华史（1857—1858年）》，第310页起。

父正在各地视察教务，我们的公使乃由梅德尔神父接待。梅神父在他致总会长及省会长的许多信件中，汇报了接待公使的一些情况。^①

我们的公使最注意的是如何迫使中国官员遵照并实行皇帝的上谕。这些上谕原是刺萼尼先生为了天主教的利益，从中国皇帝那里争取得来的。尽管这道上谕诏令要把在十八世纪被充公的圣堂和神父住宅归还给教友，但写得十分含糊。这些建筑是旧耶稣会会士建造的，在北京有许多这类建筑。如要归还，那么将归还给谁？还给旧耶稣会的继承者，或归还给当时掌管北京教区的遣使会？关于这个问题，4月13日，葛罗男爵在上船赴北京时，很明确地问了梅德尔神父：“你是否坚持要归还你们的旧教产和旧教堂呢？”

梅德尔回答道：“我们只坚持为接受我们福音的人民做善举。假如人们归还给我们，我们也得用之于中国人民；我们不要求，也不希望有什么特殊照顾。假如我们要挟过多，人们必将憎恨我们，反妨碍了我们的慈善事业。此外，我们最好还是一心依赖天主的上智，和天主委托玉成这种使命的人们的仁爱。”

“从前耶稣会会士在北京的所有的事业及其建筑是否应该重新归还给耶稣会？”答：“先生们请原谅，这里不是这个或那个修会的权利问题，我们彼此只有一种权利，即在各自的岗位上，花尽我们的精力和一切所有。既然承蒙各位把我当作耶稣会的代表，我即用耶稣会的名义，向各位坦白宣布：我们不

^① 见《中总》，第3卷第3章第46—66页；《法信》2667、2676；会谈摘要曾发表于《通讯》，第3卷第74页起。

指望在北京或在其他地区追求任何职位和任何管理权。目前在中国有遣使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以及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争得的一切归还给他们，由他们在各自宣传福音的地区内处理，如归还给我们奉命而接受的教区内，我们将同样地感到高兴；我们不考虑这些产业过去是属于耶稣会的或是属于别的传教会的。只要福音传得开，人灵能得救，通过我们或通过其他兄弟们来传布，这都没有关系。”

“当我讲完这话时，一等秘书站起来，紧握我的手，说：‘你们是真正的传教士、神父，怪不得你们的事业能得到天主如此的祝福。’上述谈话，我随着不同的场合，又重复了两三次，但始终只是口头的。可是我得声明，关于我们在北京另立科学机构的问题，得罪了遣使会会士，我看这并非由于公使本人，而是由于另一位重要人物没有真正领会我答话的要旨，以致措辞失当，引起了误会。我看公使并不那样，他很理解什么是仁爱，什么是传教士之间应有的紧密的团结。传教，固不在争论地盘和争夺教产和机构上。”

梅德尔神父的答词，博得耶稣会总会长的赏识，他也向教宗庇护九世呈报了，教宗对此也极表满意。^①

在中国拒绝接受可以接受的条件之后，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并毁坏了大沽炮台；于是北京派来了两位全权大臣；1858年6月13日至27日，在天津，中国同四个基督教列强签订了条约。6月27日同法国签订的条约中的第十三款，与传教事业密切相关。

^① 总会长贝克斯1858年7月13日信，见《徐档》，卷宗F11；吕比荣1858年7月4日信，见《徐档》，卷宗F13。

“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①

这比刺萼尼公使争得的上谕更进了一大步。传教士们从此正式获得官方允许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

在远征白河期间，上海传说纷纷，说联军遭受惨败；有些人还说担任联军随军司铎兼翻译的，同公使一起北上的梅德尔神父，已在这次战役中丧生。这一切可尽是谣言。梅德尔会长在那时期，即使出门，也从未离开过江南，但这些消息已足以使上海周围的地方官开始对教友们作难了。^②

7月3日，皇帝批准北京条约后，7月中旬葛罗男爵与额尔金勋爵来上海逗留时，调门转变了。满清官员正组织一个委员会，会同基督教列强代表，讨论建立海关税则。可是该委员会经过三个多月才组成。公使们利用这时机去了日本，同日本订立了条约，标志着日本新纪元的开始。^③

中国官员终于到了上海，开始了无休止的谈判（从1858年10月至1859年3月）。不久便明显看出，中国派来的全权大臣们的使命就是不执行已签订的条约，并从中逐条逐款地加以限止，他们特别反对扬子江若干港口对外商开放。额尔

^① 见高田：《征华史（1857—1858年）》，第445页。（此处系中法和约第十三款中文原文。——译者）

^② 见《通讯》，第3卷第84页起。

^③ 梅德尔1858年11月6日信、谷振声1858年9月1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05页起。

金勋爵为了表示条约业已签订的既成事实，在1858年11月8日至1859年1月1日，带了多艘军舰溯长江而上直至汉口。^①

直到1859年3月，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才完成使命，启程返回欧洲。

英法两公使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伯爵在上海逗留期间，屡次到徐家汇和董家渡参观，对修士和学生们的学业颇感兴趣，并施舍了大量的东西；普提雅廷曾多次到天主堂望弥撒，他对江南教区念念不忘。十二年之后，当郎怀仁主教和薛孔昭神父去罗马参加梵蒂冈公会议时，在罗马又重逢了这位俄国外交官，他还请他俩一起进餐，并表示诸多关怀。^②

为了同北京朝廷正式交换经两国元首批准的条约，基督教国家的公使们约定于1859年6月在北京换约。法国派了布尔布隆，英国派了额尔金勋爵之弟卜鲁斯担任这个使命。6月初，他们到达了上海，会见了清皇朝特派的钦差。清朝官员们竭力想阻止他们北上，但终于徒然。1859年6月20日，英国一支舰队，由海军准将贺布指挥，法国则只有一艘战舰“杜坎拉”号，由司令特里科指挥，在白河口集结待命。白河口有坚强防御工事封锁着，中国官员竟无人前来接待英法公使；贺布无视中国方面的防御准备，^③决定用武力打开航道。

① 高田：《征华史（1860年）》，第21、33页起。

② 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41、151页；梅德尔1858年4月13日、7月22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75、89页。

③ 梅德尔1859年7月30日致省会长信中提到，他曾请外交官及军官们注意，要谨防中国方面的诡计；他曾劝告他们切勿以不足的武力直趋大沽。见《法信》2664。

6月25日，大沽口炮台以猛烈的炮火迎接了英法联军的登陆；虽有军官与海军们英勇奋战，但还是被迫停战撤兵，退回上海等候增援；这次战役，联军有四百三十二人丧失战斗力，法国特里科司令和英国海军准将贺布均负重伤。

这次进攻大沽要塞，贺布表现了少有的鲁莽，而中国人的诡诈却更加突出了，他们的言而无信和对外国使者的侮辱，激起了英法两国的强烈愤慨，因此英法两国决定进行报复。一次正规的远征马上开始了。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再次领军北上。^①人们可以设想大沽事件的消息会使上海产生怎样的印象，中国人都以为中国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了。^②

在中国内地，仇教的谣言又开始传布。上海更加恐慌。圣依纳爵瞻礼日，徐家汇第一次不接待外宾，而且谁也不敢远离租界，深怕受到袭击。8月1日，年文思主教写道：“近两三天来，一阵令人丧魂落魄的恐怖笼罩了整个上海。8月1日，在几艘专运华工出国的外国轮船上，发生了不幸的骚乱之后，在洋泾浜外国人居留地一带，更是人人感到生命危殆。人们互相猜疑，洋人认为中国人在威胁，中国人认为外国人要谋杀中国人。事实上，路上确有人被击伤，也有人被杀害。租界洋人当局同中国官方进行了磋商，同意彼此采取措施，防止同样的惨案再次发生。”^③

在这些日子里，神父们更极度地保持冷静。从大沽口勇

① 高田：《征华史（1860年）》，第61页起。

② 同上，第71页起。《英国议会文件》转译了许多中国文件，见2587号（1860年）；卜鲁斯先生的通信。

③ 年文思1859年8月10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46页。